

聖經在中國

高夏芳

(編者按：本文為高夏芳修女為《中國教會的今天與明天》一書而撰。承蒙作者及出版者允許本刊轉載，以饗讀者，特此致謝。)

宋代文人黃山谷有此關於讀書的名言：「人胸

中不用古今澆灌，則塵俗生其間，照鏡覺面目可憎，對人亦語言無味」。可見讀書實能陶冶性情、提高氣質、增長智慧、滋潤生命。

中國人很著重讀書、很敬佩「讀書人」，很崇尚書香世代的家族。平庸一點說：「書中自有黃金

屋，書中自有顏如玉」，透過讀書可找到美滿生活。高雅一點看，博覽群書能增廣見聞，擴闊視野胸懷，能使人擺脫粗陋，超越封閉，洞悉天地之遼闊，了解歷史之浩瀚，體會人生之奧妙，能導人與古人遊，與智者會、與聖賢豪傑交友。

四書五經、經史子集、詩詞歌賦、散文小說，數千年文化精華凝聚於書本，中國人要讀的書多著呢。還有各家各派，各門學術、科技、藝術都有其專書寶訣，讀之不盡。

在宗教方面，書本典籍有其不可取代的重要

性。試看佛教之傳入我國，唐代僧侶如唐玄奘等，歷盡艱辛，西遊至印度取真經，繼而譯經、研經、解經，這番工夫影響至大，促進佛教在我國紮根茁壯，發展廣傳，傳流深遠。

我們試問：在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歷程中，聖經——基督徒的經典，扮演了什麼角色？在一塊典籍為文化支柱的土地，在一個重視文字、書本的國家，聖經在信徒團體中佔何地位？

著禮儀、牧民及靈修，它增廣其活力。大額我略有此妙句：「聖經隨著它的被閱讀而增長」。（註一）從它的寫成至今二十多世紀以來，聖經行走及成長了不少，它被傳於世界各地，被翻譯成二千多種文字（註二），滲透整個西方文化，被演繹成詩歌、舞蹈、音樂、戲劇、電影、圖畫、雕塑，成為西方文學及藝術的「基本符號」（註三），更影響了各門各派的哲學思想及人生觀。

在中國，聖經傳入只有四、五個世紀，與華夏五千年悠久歷史相比，只不過是短短的一段；但無可否認，進入中國後，聖經也在中華大地「行走」、「成長」。起初進度緩慢，但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之後的數十年卻由細步轉至奔馳。

(a) 傳教初期

公元十六至十八世紀，天主教漸漸在中國發展，在教會歷史中，那時正值特利騰大公會議後的保守時期，傳教士們與當時普遍的見解一般，認為

經學者及神學家的研究，它能在深度方面長進，藉影響之深遠，卻不斷與時俱增。藉著見證它、活出它的人，聖言的可信性及真實性不斷增加，藉著聖

聖經應小心謹慎地閱讀。為防誤解，普通教友不需直接閱讀聖經。為信仰而言，最重要的經典不是聖經，而是教理。傳教士們也不一定攜帶聖經來中國傳教，按當時西方的一般情況，他們自己讀聖經也多是透過彌撒讀經經本，而非直接與整本聖經接觸。為此，天主教在中國，為人樂道的是其偉大、博學的傳教士、壯觀的教堂、嚴密的組織、高度的效率、慷慨寬宏的慈善功績、獨特的禮儀及宗教習俗等等，而非經典及宗教文學。就算在基督徒心目中，聖經是信仰的源流與根基的意識並不清晰。為一般教友，祈禱經本或要理問答比聖經更親切。

聖經的中文翻譯也出現得相當遲。基督教踏入

中國不久，在十九世紀末已有好幾種聖經中譯本，天主教雖然已於一六一五年獲得教宗保祿五世批准將聖經翻譯，卻要等到二十世紀中葉，才有思高聖經學會譯釋的中文聖經出版，普遍通用。

不過，聖經的遲被翻譯及少被直接引用不等於它在中國教會發展中不關重要。其實，初期傳教士

無論在福傳、教理講授、牧民訓導或禮儀宣講中，都大量引用及講解聖經。透過口傳，很多信徒，雖未讀聖經，卻對聖經故事十分熟悉，且能領會其深義。也有傳教士將聖經事蹟編寫成書，尤其有關耶穌的生平事蹟，最為信徒們愛聽、愛讀。耶穌會士艾儒略 (Giulio Aleni) 就於一六三五年編寫了一本「天主降生言行記錄」，以敘述耶穌生平的方式來介紹四本福音的內容。以後兩世紀陸續有「聖經直解」或「聖經淺解」等書本出版，從禮儀、神修及牧民角度解釋聖經的不同片段。(註四)

(b) 梵二的推動

梵二之後，整個教會都致力更新，一面返璞歸真，一面向世界開放，將福音傳入現代社會。聖經的重要性在教會的意識及生活上大大提高。梵二《天主的啓示教義憲章》開宗明義指出聖經是天人交談、天人契情的表露：「天主因祂的慈善和智慧，樂意把自己啓示給人，並使人認識祂旨意的奧秘……」

不可見的天主，爲了祂無窮的愛情，藉啓示與人交談，宛如朋友」（註五）。基督徒的天主是一個創造人，愛人，喜歡與人溝通的天主。祂向人顯露自己，也使人因此而對自身的價值、意義及取向，有更深的認識和珍惜。

教會從聖經中不斷吸收滋養及活力，深信「天主的聖言具有那麼大的效力和德能，以致成了教會的支柱和力量，鞏固教會子女們的信仰，成爲他們靈魂的食糧及靈修生活永久和清澈的泉源」（註六）。所以必須讓信友們直接地、廣泛地接觸聖經。在聖經中成文的啓示不是抽象的，而是在歷史中實現，是實在的，可體會的。在這天人交談中，人能透過一件件事情，一段段的記載，悟出天主的救恩計劃。這啓示不停留於資訊或認知的層面，而是爲使人「分享天主的美善」（註七），使天地感通，神人契情。讀聖經的最終目的不在於對文字的了解，而是正如大額我略所說：「讀聖經就是學習如何透過主的說話，去認識祂的心」（註八）。讀主言、入

主心，這個概念，在教會的傳統中，一直根深蒂固，教會早期教父們十分重視這幅度。語言及文字不是絕對的，書本始終是一個溝通媒介，用以達意、用以表心、用以通情、用以傳神、用以啓發思想情懷。聖經也不例外，它以有限的人言傳達無限的主言，它的每一字、每一句，都可說是超載的，含有無窮內蘊，潛藏著一股奧妙莫測的動力及一個天人相遇的機緣。今日教會愈來愈強調這點：讀聖經不可止於對經文作學術性的「解」與「釋」，更應設法達到「融」與「通」，與發言的天主相感應，起共鳴。務使讀經者能有「基督的心意」（格前1：16）、「懷有基督耶穌所懷有的心情」（斐1：5），及體驗到那種「心有靈犀一點通」的默契。

耶穌在離世升天前曾這樣應許：「我本來還有許多事要告訴你們，然而你們現在不能擔負。當那位真理之神來到時，他要把你們引入一切真理」（若十六：12-13）。啓示之成言、成文、成書，這整個過程都在聖神的引導下完成。保祿清楚地指出

聖經是「受天主默感寫成」（弟後二：16）。「默感」這詞，無論在希臘文或拉丁文都潛藏著「噓氣」的意義；在聖經中有聖神的氣息，有一股動力，催人向善，引人邁向成全（參閱弟三：16），使人「獲得得救的智慧」（弟三：15）。聖經在默感下寫成，被動地吸收聖神的氣息，也處處發散著這股氣息並主動地吹讀者以氣，啓發讀者。所以，如奧利振所說，閱讀聖經不可能沒有聖神臨在、輔助，因為讀經本身就是：「按聖神之意去聆聽聖神之言」（註九）。教宗庇護十二世在他的《聖神默感》通諭中也說：「我們若要了解和解釋聖經之意義，便需要同一位聖神降臨，需要祂的光和恩寵」（註十）。默感是聖神在聖經形成階段的化工，詮釋聖經則可說是這化工的延續，雖然方式不同。「聖經既由聖神寫成，就該遵照同一的聖神去閱讀、去領悟」。（註十一）

這種屬靈的、動態的特質，不但重推理分析，也重心領神會，妙悟貫通的讀經方式，把聖經與中國文化拉近，使人能體會那種「拍案叫絕」的震撼

力，那種「繞樑三日」的甘美，或那種「相逢恨晚」的珍惜。

(c) 新展望

梵二這股清新的靈氣自一九六五年大公會議結束後，很快便發散於全球。在中國方面，港、澳、台等教會立即響應更新，大陸卻因政治關係，梵二精神遲到了二十多年。不過，改革開放後，大陸教會勇敢面對重重困難，急起直追，快步猛進。

筆者最近十年經常去大陸各大修院授課，教授新約釋經，也曾以聖經為中心，帶領神父、修生、退省或進修。顯而易見，國內的年青神父、修女、修女對聖經的興趣甚濃，研讀精神可嘉，求知慾很盛。除了學術釋經外，他們都很關心怎樣以聖經為神修基礎，在牧靈工作上如何應用聖經，怎樣引導教友們勤讀聖經，愛上聖經及活出聖經。

二十多年前，在大陸要找一本聖經來讀，不是易事。現在情況好轉了，擁有聖經、時常誦讀，已

毫不困難。不過，聖經不是一本易讀的書，這本書其實是一個圖書館，包括了七十二本不同年代寫成、不同社會背景、不同文學體材及寫作風格的書，要進入境界，把握其訊息，需要一些指引、一些入門功夫，不能妄想無師自通。在大陸，教聖經的老師及導人讀經的書本資料還相當欠缺。最近十數年有不少神父、修女負笈歐美，攻讀神哲學各學科，其中讀聖經也不乏人，已有好幾位學成回國，在修院教授聖經各科目，也熱心推動聖經牧民工作。他們有熱忱、有理想，是中國教會的希望，只是他們的數目還太小，實力也不強。在此衷心祝福及鼓勵他們，願他們人數增多，彼此互聯互助，努力不懈，能有創意地、有效地、更深入地把聖經帶入教友們的生活中。

一個令人鼓舞及感恩的事實是在港、澳、台各地平信徒們對聖經的熱愛，與時俱增。平信徒們發起及帶領的研經班、聖經分享小組、聖經進修課程等多采多姿的活動使教友生活更活潑、更有深度、

更團結。在大陸的信友團體中，雖然資源與自由空間都有限，這些活動仍不缺。這都是天主聖神帶領教會的跡象。還有，在海外的天主教華人團體中，聖經真的愈來愈成爲教友們生命動力及平安喜樂之源，筆者曾在最近數年到過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澳洲及美加一些華人天主教團體作聖經研討會及講座，被信友們對信仰的認真及對聖經的熱愛而深深感動，也得知有不少信友每天抽出一小段時間作家庭讀經，讓聖言成爲家庭生活的指南及日用糧，值得敬佩效法。

自從聯合華語聖經協會成立之後，（註十二）各地熱愛聖經的華人教友可透過定期聚會及書報刊物的交流增加彼此勉勵，分享聖經心得，聖經靈修及聖經牧民經驗。還有，由教廷傳信部海外華人牧民部由千禧年開始定期舉行的全球海外華人福傳牧民會議，雖不常以聖經爲主題，但是一個體驗來自不同地方的華人讀聖經的好機會。至今爲止的兩次會議都強調聖經對華人福傳及靈修的重要性。

另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是聖經也在中國教會之外「行走」及「成長」。早在二十世紀初，聖經在我國文壇及思想界已不陌生，有關於聖經及基督教思想對五四運動時代及整個二十世紀前半部的中國文學影響已有充份的專題研究。(註十三)二十世

紀後半葉共產黨當政，在壓抑宗教的無神主義下，聖經的魅力仍在暗暗發散，吸引著尋求精神滋養的知识份子及人數漸增的「文化基督徒」。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後，大陸提倡促進精神文明，不少大學開始設立專門機構，作宗教研究，對那長久深遠地影響了西方文化的基督宗教聖經尤為著重，(註十四)也出版了一些介紹聖經及釋經方法的書籍，又陸續翻譯了一些古今釋經作品。這些學術性的研究，雖然還相當零碎乾枯，缺乏教會傳統及神學反省的滋潤，沒有從信仰而來的融會貫通，但仍非常可嘉，值得鼓勵支持。與這些教外學者交流，天主教聖經學者會得益不少，尤其在如何把聖經帶入中國文化這課題上，可得到寶貴的啓發。在國內愈來愈多的

教外學者誠意並嚴格地研究聖經，這也是聖經在中國「行走」與「成長」的印記。

在中國文化氛圍下閱讀聖經

梵二之後，教友們讀經不但更直接、更全面，在量方面更頻密，也在質方面提高，對聖經的歷史背景、文字、結構有更深的認識，也能進一步領會其內蘊。還有一個顯著的大躍進，是意識到聖經與文化的密切關係，聖經本身就是一個漫長的文化傳承過程的結果，是不同文化，包括猶太、美索不達米亞、希臘、羅馬等地的思想模式，習俗的聚匯點。成書後再繼續向各國文化開放，無限度地延展。梵二以來對信仰本位化的理論及實踐都很突出。有關聖經的滲入不同文化，宗座聖經委員會一九九三年的文件「教會內的聖經詮釋」清楚指出：「一篇文章的闡釋往往取決於讀者的關注和意向」，所以，本位化的努力不可間斷。當提到一些福傳工作只在萌芽的國家時，該文件指出「傳教士難免帶回根植於他

們本身國家文化的聖言，效令新的地方教會要以各種努力，把這屬於異國文化的聖經轉變成爲一個更貼合他們當地文化的形色」。（註十五）

在亞洲各地，本位化促使聖經以一個新的姿態出現，亞洲基督徒開始從一個新角度去發掘聖經的美妙，他們驚覺這書與他們的思維是多麼接近。他們熟悉這書的敘述模式，打比喻的技巧，圖像寓言的多采多姿，富詩意的禱詞，先知們的警世言論，智慧文學的箴言雋語；這都是他們傳遞經驗和世話智慧的慣用方法。這種新發現的親切感於一九九八年在羅馬召開的亞洲主教會議中被進一步肯定。主教們強調耶穌生於亞洲、長於亞洲，福音發源於亞洲土地，教會也在亞洲誕生，在亞洲開始發展。聖經的七十三本書，除了數封保祿在歐洲寫的書信外，全都在亞洲面世。聖經的思想結構、文學體裁、寫作格調，基本上是東方式的。

很矛盾，在耶穌出生的亞洲，時至今日，基督徒只占人口的百分之三，是極少數民族，爲何如此？

各種政治、社會及文化因素非常複雜，不能籠統而論。不過，一般亞洲神學家都認爲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天主教傳入亞洲各地之始，是以傳遞教理教義爲主，崇尚理性。這與東方人的宗教情操及對神聖啓示的冀盼有所距離，以致今日福音未能快捷地直搗人心。透過今日對聖經的新發現及熱忱，我們可與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一起期望基督的福音「能在第三個千年在亞洲結出豐盛的果實」。（註十六）

中國教會與其他亞洲教會無異，也期待著透過深入吸納及活出聖言，教會能在中國紮根、茁壯，救恩的喜訊能給我國億萬同胞帶來生命的滿盈。爲能達到這目的，教會還需要在聖言本位化方面加倍努力。牧者及神學生都應增強中國文化修養，與研究聖經及各神學科目並步，務能成爲有效媒介，使天主能以中國人的方式向中國人說話。

在學術研究方面，有關中國式的讀經，雖然仍未出現一些全面性、系統化的反省，但已有不少寶貴的提示及貢獻，比如翻閱台灣輔仁大學神學院出

版的「神學論集」，就有不少有啓發性的釋經文章，表露出一些中國人讀經及釋經的特徵。也有作者把聖經片段與一些意義或背景相關的中國典籍共讀，相映成趣，發人深省。特別有意義的是房志榮神父及胡國楨神父以聖經的文學體裁與我國經典類型相比較，把聖經文化與中國文化拉近，令中國人倍覺親切。

筆者亦曾在這範疇作了一點反省，（註十七）指出亞洲人，尤其是中國人，在詮釋聖經時的一種獨特觸覺。比如，習慣認為「言有盡、意無窮」，習慣欣賞水墨畫的「留白」，中國讀者容易被引領到文字和符號以外的意境及神韻，讀經不只是「理解」更是「領悟」。又比如在解釋古代典籍時，中國人十分著重前人的經驗，孔子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七：19）。讀聖經就如與歷代信仰先祖相遇，「考究歷代古人的智慧」（德三十九：），因此讀經時聯想力也強，能以經解經，找出其一貫之道，體驗其萬古常新之妙，就如耶穌在

福音中把自己的門徒比作「一個家主，從自己的寶庫裏提出新的和舊的東西」（瑪十三：52）。又或中國人喜歡背誦經典，把聖經金句「默存於心，反覆思量」（路二：19、51），在適當時從中的寶庫湧出，成為「步履的明燈」（詠一一九：105）。這都是一些點點滴滴的零碎反省，但足以令人興奮歡欣。天主會對以色列民說：「這話離你很近……」（申三十：14），祂也可同樣對我們中國人說祂的聖經，乍看與我們相距很遠，其實不然，很近、很親切。

在學術研究方面，還有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創舉，就是二零零四年首次舉行的全球華裔不同基督教宗敎的聖經學者聚會，題目是：「今日及將來的聖經研究」，聚會地點是香港中文大學。五十位來自世界各地及不同教派的聖經學者共聚交流，內容非常豐富。研討會是國際性、大公性的，參與者的共同特徵是大家都是聖經學者，大家都有華人血統、華人文化，大家都想出力，使聖經能在中國廣傳。經過首次聚會後，參與者都一致贊成建立一個聯絡

網，並以後定期在不同地方舉辦研討會。

這些學術性的研究及討論，能使聖經與中國文化互動互通。除了在學術層面外，在牧民、靈修、教理講授、講道及聖經分享各範疇。熱愛聖經及對聖經有深入認識的中國人，都會自然地尋找及應用適合中國人的方式，把救恩的喜訊傳給自己的同胞。

一個聖經圖像

衆所周知，聖經的語言風格不以理論爲主，卻多應用比喻、圖像、象徵來勸諭、宣佈、鼓勵、表達關懷愛護。在此，我想把一個聖經片段，一個寓意性的圖像，放在讀者面前，願大家從中得到啓發。

耶穌復活那一清早，一群婦女急急上路。她們小心翼翼地捧著買好的香料，預備數抹耶穌的遺體。耶穌死時，剛是安息日開始前數個小時，所以他的葬禮很急促草率。他的遺體只簡單地被殮布裹好，放入一個岩石鑿成的墓穴裡，用一塊大石蓋住。一路上，她們心情緊張、又悲傷、又迷惘、又害怕。除此之外，她們還有一個實際的問題要解決：墳墓被一塊巨石蓋住，她們不能把它搬開，又不知找誰幫忙，一路上，她們的憂慮愈來愈大，彼此詢問：「誰會爲我們從墳墓門口滾開那塊大石呢？」（谷十六：3）。她們與耶穌有一石之隔，但如何超越這障礙？

事情的演變遠超過她們所能預料，一接近墓穴，她們便發覺原來大石已被搬走，她們的憂慮全屬多餘，連她們小心預備的香料也毫無用處。墓前有天使向她們報告：耶穌復活了，隨後，耶穌還親自顯現給她們（瑪廿八：9-10）。

「誰爲我們滾開那塊大石？」這個問題，耐人尋味，也可應用在我們讀經的努力上。有時我們也會覺得與耶穌有一石之距，二十個世紀的歷史把我

冷清蕭條地躺在墓穴，所以安息日一過，天還未亮，她們便迫不及待地來掃墓，並帶上在殯葬禮時必用的香料。

們與他分隔，思想模式的不同，文化背景、生活習慣等各種差距，使我們覺得好像無法走近他、接觸他。覺得這納匝肋人耶穌，可遠瞻而不可近看，他所顯示的天主，可崇敬但不可親。我們知道在福音中可讀到耶穌的生平，聽到他的宣講，投入他的思想情懷，但偏偏那本厚厚的聖經就好像一塊沉重的石頭。有很多生澀的字眼，難明的章節，不易把握的思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片段，莫名其妙的描寫，不知所謂的圖像，不清楚的背景，這一切都會令我們卻步不前。誰爲我們滾開那塊大石？我們決意去求助，好能越過這障礙，得見石頭後面的耶穌。我們去參與神學或聖經課程，找注釋、覓導師、下苦功。這番努力自然值得讚賞，也是必需的，但別忘記，我們找的不是一具需要敷抹的屍體，而是復活了的耶穌。聖經中的耶穌不只是位二千年

異事的宇宙主宰。我們讀經不只是要尋找祂，也是祂要尋找我們；不只是我們想聆聽祂；也是祂想向我們發言，向我們示愛，不論我們屬於什麼文化、語言、種族、國籍。不用太擔憂搬開大石，祂會超越大石，超越文字的艱澀，和我們相遇，與我們交談。

註釋：

1. "Scriptura cum legente crescit", Gregory the Great, *Moralia* 20, 1 (CCL 143A, 1003).
2. 按聖經公會 (Bible Society) 的最新統計，聖經已被全譯或局部翻譯成 2,303 種文字。
3. N. Frye, *The Great Code*, The Bible and Literature, London, 1982.
4. 參閱 N. Standaert, *The Bible in early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in I. Eber - S.K. Wan - K. Walf, *Bible in modern China. 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Monumenta

Serica, Sankt Augustin, 1999, 31-54.

五・天主詔諭及譯解 2。

六・天主詔諭及譯解 21。

七・天主的詔諭及譯解 6。

八・Gregory the Great, Registrum Epistularum V, 46.

九・Origen, Homilies on Leviticus IV, 1.

十・庇護十一世，《聖經默感》譯解，1943。

十一・天主詔諭及譯解 12。

+11・聯合華語聖經協會（United Chinese 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於1990 成立，聯合香港、澳門、台灣、印度、尼泊爾、尼泊爾、新加坡、澳洲等地聖經牧師工作。聯合會辦了七次大會，最後數次還爭取到大陸代表參加。聯合華語聖經協會出版一本專刊「禮」。

+111・參閱楊劍龍（Yang Jianlong），*Die christliche*

Farbung der Erzählliteratur der 4.-Mai-Bewegung, in R. Malek (ed.), "Fallbeispiel" China. Okumenische Beiträge zur Religion,

Theologie und Kirche im chinesischen Kontext, Sankt Augustin, 1996, 165-175; L.S. Robinson,

The Bibl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Fiction, in *Bible in modern China*, 237-278.

+12・參見M. Nicolini-Zani, L."Accademia" cinese

e la cultura cristiana: luoghi e tendenze dell'attuale ricerca sul cristianesimo in Cina, in P. Siniscalco (ed.), *Cristianesimo e storia. Rapporti e percorsi*, Ed. Studium, Roma 2002, 171-198; 麗鴻 (Lian Gong), Twenty years

of Studies of Biblical Literatur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1976-1996), in *Bible in modern China*, 383-407.

+13・教會內部聖經詮釋，4b。

+14・「教會在亞洲」。

+17・參閱呂慶林，「在中國文化氛圍下聖經翻譯，第十五屆中國華語聖經研討會論文」，新加坡 1998。□